

人物话语间性与城市地图显影

——论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城市叙事

晏杰雄, 朱宣阳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 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城市叙事中, 林林总总的人物步行于多重社会空间, 出于人物之口的各色语词, 提供了介入城市表里形态演进的关键入口。这些语词之间存有一种“人物话语间性”, 即人物话语之间的内在相关性与交互影响性。一系列作品透过人物话语间性组织着城市的不同图层, 不仅囊括了物质层面的地理空间装置及其分布, 拼嵌出超话语的地缘视景, 更容纳了历史人文质素和心灵成分, 图绘出同时代的精神景观。作者在现实城市与文学城市之间找寻到相通的句法体系, 而对地方语言、话本传统、日常本相等的有机应用更折叠出多重审美张力结构。由此, 小说中含有内在生命的各异城市世界, 开始联结为赋有地理美学和文化诗学特征的新城市意象群落。

关键词: 新时代长篇小说; 城市叙事; 人物话语间性; 城市地图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3-0208-11

筑造于异质性、对话性基础之上的间性概念, 广布于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领域, 派生出主体间性、文本间性、文化间性等枝蔓纵横的理论分权。其中, 在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二分范式的解蔽及反思之下, 胡塞尔率先提出“主体间性”, 或称“交互主体性”: “在先验的具体性中, 与这个共同体相一致的是一个相应的开放的单子共同体, 我们把这种单子共同体称之为先验的交互主体性。”^{[1](195)} 独立对等的多重主体彼此观照, 存在互相交流、互相理解、互相影响的规定性关联, 同时获得客观实在的一致性。考虑到文学语言的实质是社会性话语, 循着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理论视界继续生发延展, 我们不妨将“人物话语”与“间性”缔合为一新概念, 以辨析小说世界内部个体言语活动的属性和效用。巴赫金曾如此分析言语交际的内在属性: “对活生生的言语、活生生的表述的任何理解, 都带有积极应答的性质(虽然这里积极的程度是千差万别的); 任何理解都孕育着回答, 也必定以某种形式产生回答, 即听者要成为说者。”^{[2](148)} 依此推论, 内在于多元言语主体的应答性质, 也是“人物话语间性”概念合理性的一大本质前提。故可以得出, 人物话语间性指的是不同人物话语之间互动联系与交相建构, 以主体性、交互性、动态共识性为根本特性, 聚焦的是应答式对话秩序所纺成的关系状态和互涉处境。从客体层面看, 活动中的言语交互性是人物话语间性的题中之义, 呈递出共识背景下的客观时空表现; 从主体层面看, 言说着的主体则为人物话语间性之内核支撑, 是源头亦是主干, 以建构者与经营者的身份承担了精神发生的任务。由此, 我们打开了一个考察长篇文本的新窗口, 弥散于人物之间的参差话语倚仗其与生俱来的间性特质, 自如自然地化为丈量物理空间的鲜活轨迹, 从而实现循环性的图像式审美空间建构。

新时代以来, 确实出现了“文学格局的整体转变”, 已然构成一个“新时代文学”的文学史分

收稿日期: 2024-10-10; 修回日期: 2025-04-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长篇小说文体发展史”(20BZW171)

作者简介: 晏杰雄, 男, 湖南新化人, 文学博士, 美学博士后,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 联系邮箱: 1056179522@qq.com; 朱宣阳, 女, 浙江义乌人, 中南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当代小说批评

期。^[3]在这个时期,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成果, 深具现实关怀的长篇小说作家开始致力于城市叙事, 成为新时代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作为城乡融合、人际交往的集散地, 当下城市空间体现出显著的人物话语间性。作家们相应重视现实场域中活生生的言语, 让人物主体和主体彼此敞开, 涌出生命力的呼吸感。在小说中, 诸多个体发声、对谈, 宛若水面微荡的圈圈涟漪, 动态性地激活附有地理认知或文化表征的丝丝线索, 并持续性地迸散开去。在流动着的声音水系之中, 容纳了城与乡、人与城、人与人对话关系的间际网络, 开始现出细密印迹。由此, 听觉层的片段式言语逐步交织叠加, 转而汇合成为视觉层的整体化社会图景, 显影出可听、可观、可感的生动城市地图。

一、言语交互性图构城市时空经验

在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城市叙事中, 贴近真实大地的人物话语彼此呼应、牵引, 如串珠缀玉般落于叙事画卷, 在各地城市风物的呈示上占据特殊地位。人物话语间性所携带的社会性、生活性质素, 为日常的时空感知赋形, 进而凭靠时空经验所涵覆的坐标轴线, 为“物质的城市”赋形, 描画出一幅幅内含异质性与变迁性的城市物理地图。理查德·利罕曾谈道: “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模式和文学模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4](3)}在时代气候与地方厚土的一同滋育之中, 关于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文学理解持续更新深入, 这种双重建构模式, 促使笔墨间的“新城市”萌动、生根、蓬勃。小说中内在自足的社会化语词、语境以及诸多言语主体, 融为一个个意义集合。人物一来一去的对白倾注而下, 组搭成一种召唤式、指向式的意蕴结构。正是这种潜层结构, 对那些出口言说的生命存在予以行走生活的推力, 让他们在小说世界所标注的客观地点、场景之间重复交错, 借助言语交互去触及地方城市的生活边角, 去撷取散落于时空轴线的情思体验, 去召唤早已融于城市骨血的深隐的地域特征与历史含义。

在《繁花》《人世间》《烟火漫卷》《烟火》《仪凤之门》《烟霞里》等小说里, 日常时空经验的托举之力, 赋予了人物话语生长、播散的无尽生存潜能。巴赫金曾说: “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 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 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 空间则趋向紧张, 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 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5](274-275)}如果选择从具象层次来看艺术时空体的涵义, 其中一个核心表现便在于时间的可见性, 即在某个特殊场域中, 无形的时间在特定空间装置之内流转, 渐渐稠叠, 现出线条交杂的形状。这种身负多重蕴涵的时空体及其缀连的时空经验, 也可以说是新时代长篇小说城市叙事中屋基式的组成单位。那么, 人物话语间性特质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效用呢? 实际上, 这类时空体式视野下各有详略的具象建构, 有时是在看似不起眼的人物话语之下被悄然解锁, 并实现自然融贯的。不论是因何指引, 人物言明往某处去, 或视及某人某物, 线索便流向哪儿去,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应答的落脚点在哪, 再回应的表达层次有何变化。“一旦我们开始通过语言或符号描述和表达空间时, 我们的主体性已经介入了那个原本存在的空间客体, 我们通过不同的主体经验与思维方式去认识和把握同一个空间实在。”^{[6](21)}这里“我们”同样可以投射于小说世界里的言语主体。在这个意义上, 若往人物言说的“现实”本体继续迈进, 可以察觉到人物话语间性与主体经验表达的重合作用。伴随着这种内在的重合, 小说对带有时间表征的空间实在完成了整合, 对多重艺术时空体完成了塑型。也就是说, 多重言语主体的交互性对话和理解是时空经验的显现方式之一, 小说辅以人物话语间性的编织, 图构了个体面对物质城市的时空经验, 借此使得一处处街巷时空体、楼屋时空体、桥路时空体等拔地而起。

更重要的是,关联起城市要素的言语主体,不仅仅是移动中的声源,更是结构于且依赖于城市历史、地域、文化(包括语言在内)的动态主体。依据不同的截面去探照这些具象化的艺术时空体,可以从“地方”与“历史”两个主要话题加以解读。借助人物话语间性的能量,一批新时代长篇小说以物理存在为依托,摹画出各异“风土城市”所蕴含的地方性、历史性色彩。整体观之,这些小说中显影城市物质世界的诸多独语或对话,常常是以个体的城市记忆作为重要支撑的。在人物话语背面的个体记忆中,往往隐显了动态发展的地域和历史信息,这些信息将协助构图地方的城市、历史的城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认为:“记忆寓于走动、穿越、透过某地、迂回前行之中。”^{[7](91)}言语主体的记忆也正寓于所踏足的城市物质存在之中,同城市的地质地貌、建筑景观等深度耦合,进一步增加时空场域的记忆厚度,深化、细化城市生活史的回观。落实到具体语境中,言语主体的应答形式意味着从特定个体视角向身负地方历史文化的城市投注目光,由物质现象的追述指向记忆编码的呈现,以此达成潜在的互动式理解与认同。弗朗科·莫瑞蒂明确指出:“(小说中的)地理并不是惰性容器,也不是文化史‘发生’其间的盒匣,而是一种活性力量,渗透于文学场域,并对其进行深度塑造。”^{[8](3)}由此可见,小说世界内部的地理空间表面上是位置和状态相对固定的无机容器,实则具含一定的生命性特征,凭借其能起作用力形塑着文学作品的表里形态。在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城市叙事中,人物话语间性织造的繁复网络赋予文本镜头更多自由,城市的物理特征在人物言说的刹那间重现。而奇妙之处在于,正是这种书写方式,令小说所指称与描摹的具体物理空间要素获得更深程度的生命活力。言语的流质性为其提供了“移位”和“形变”的纷繁可能,并显示出层级丰富的色调特征。

就这些基于城市物理布局或建筑样态的艺术时空体而言,其中一层醒目色调便是深根固柢的地方性特征。比如《繁花》中的上海、《烟火漫卷》中的哈尔滨、《烟火》中的天津、《仪凤之门》中的南京……这些长篇小说均镌刻着地方意识的迹象,人物话语往往拥有链接至地标性空间的能力,并且完成交互式的双向确认。“地名是社会文化信息的载体,是城市发展的见证,记载了城市演变过程中的痕迹,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也是人们情感的寄托。”^{[9](181)}或是江河湖塘,或是店铺街巷,一系列地理实体被冠以互异的地点名称,成为小说中城市社会信息的侧面记录,排列出明晰而鲜活的特定城市格局。如此一来,取材自地方沃土的“颜料”在现代性的城市基底上涂画,为风土城市烘染出别具一格的身份色彩,也就能形成一份含有地理学属性,又指引认知特色地域文化的城市地图。在这里,不妨以一南一北书写城市市井生活的两部小说为例。

在金字澄的《繁花》中,以传统话本形式呈现的细细密密的对白,恰如楚楚有致的锦簇花团。数十年跨度间层叠如重瓣花的时空景观,正渗透在人物话语间性联系的细部中,由此,繁碎的对谈往来将城市自身独有的物质性空间要素勾勒出来。例如,小说透过人物话语间性显影了颇具本地建筑特色的石库门老弄堂、新式弄堂,以及人物彼此传杯弄盏“众宾欢也”的应酬之所,等等。正如有学者言:“如果要为《繁花》确定一些关键词的话,我以为应是‘对话’、‘弄堂’(地理空间)和‘宴会’这三者,三者的有机组合,织就了上海这座大城市三十多年来的非典型发展史。”^[10]又如城市代表性地理空间“苏州河”,在小说中作为一处指示历史流脉的艺术时空体,也由言谈深处意义链条的穿插照应,露出面纱之下的细貌。在言语的流淌之中,苏州河的各类码头、盘湾里及其名称来由、洋钯桥,以及周边的莫干山路、旧时学校、上粮仓库、叶家宅、青年旅馆、纺织厂等,都在字里行间显出踪影,组合营构了一处区域性、放射状的经济文化场景。小说里的苏州河甚至成为市民信手拈来的概念性物象,人物在对话间常以之为参照物或比拟物。这更显示出地域文化情境之下已深融于日常的空间特色。

而到了王松的《烟火》中,伴着人物的声口,小说勾画出蜡头儿胡同、白家胡同、宝宴胡同、针市街、锅店街、单街子等空间,以及空间内的狗不理包子铺、唐记棺材铺、石记铁匠铺、杂货店、丰

盛客栈、明记剃头房、三德轩茶馆、蚨记寿衣店等各式店铺。作品通过言语的层层互动映出承载文化信息的地点名称, 以及发生于此类具体处所的多样事件, 复原了具有一体感、真切感及地方个性的日常经验世界。同时, 循着个体言谈的线索可以发现, 小说的笔触又由城市局部的寻常巷陌向外辐照, 扩至作为整体概念的老地界儿侯家后, 以及南门外、法租界、金钢桥、城墙等场所。以地点为凭依, 以交互确认的言语将情节一一铺展开来, 细化城市地图的要素体系。在横跨百年城市生活的书写下, 作品中繁盛天津的百态人情, 随着条条胡同里的灵动人声, 晕开独特而具体的烟火气息。

这些城市叙事中的另一层醒目色调, 是流动于有限空间的无限丰实的历史性特征。一系列小说以各级地方性城市为母体、载体, 在时间之经线上聚焦于一城的空间细节形塑, 滋养出潜在时空结构下对于城市社会变迁的感知和理解。与此同时, 这些作品又依凭人物话语间性, 对接了浸润着历史生活内容的长街短巷、层楼叠榭, 营建出关于城市的历史语境。一缕缕源自往昔与当下的动态脉息, 在城市的身体上会聚, 意深而语简, 从而交织出小说的鲜活在场感和厚重历史感。

在迟子建《烟火漫卷》首章, 驾驶“爱心护送”车的刘建国一次次接到翁子安, 在每次对话中均闪过城市地图上的定点与路线, 出现了太阳岛、绥化、北安、松北……。在翁子安言明欲过阳明滩大桥的路程中, 两人发生如下对话: “刘建国忍不住问他, 这次带的什么书? 他淡淡回道: ‘桥梁建筑。’刘建国心想, 怪不得你要走阳明滩大桥呢。”^{[11](14)}紧接着, 小说自然地记叙并对比近年通车的新悬索桥, 以及旁边建于上世纪的旧铁路桥。人物话语的日常化细微交互, 引出城市物质现象的新旧共存景观, 进而呈递出双桥历史接替的厚实前册。随后, 二人驶上这座连接新老城区的新桥, 人物本身也融入这一艺术时空体中。在这里, 当下短暂的线性叙事之内, 浓缩了桥路所象征的哈尔滨历史变革印记, 涂绘出现代城市的更新与容纳, 在开篇便同叙事旨归暗暗相合。小说又经由于大卫与素描速写的年轻人的搭话过程, 灵活简明地引出多处典型老建筑的设计旧事, 还从刘骄华婆家对保护两块彩绘玻璃的嘱咐中延伸出家族历史往事, 折射了城市中西文化交汇现象。此外, 作者设置了一处中华巴洛克风格的标志性建筑——榆樱院, 随人物言行时隐时现, 几乎贯穿全篇。小说人物陈秀曾说, 踏出院子门洞是进入大都市, 而踏进门洞则是回到“旧社会”, 这一隐含着历史信息的“半土半洋”的院落, 与现代新型建筑共处于文本的城市地图之上, 似是今昔变化的一条时空分界线。正如迟子建在后记中所说: “从这些遗留的历史建筑上, 能看到它固守传统, 又不甘于落伍的鲜明痕迹。这种艺术的挣扎, 是城市的挣扎, 也是生之挣扎吧。”^{[11](304)}对榆樱院历史性特质的书写不只呼应哈尔滨城市变迁之史, 亦升华至时代变化间生命个体的复杂生存姿态。

而魏微《烟霞里》的五卷题目便标明了李庄、江城、清浦、广州这几处地点, 故事循着“乡镇—县城—都市”的个体行踪, 铺开起于1970年约四十年间的一连串重大历史事件。如有的学者所言: “小说以田庄之眼撷取新闻史料, 让历史内化于人事, 以追求总体性大于史料之和的叙述效果。”^[12]这种人事与史事的缠卷, 亦借各种城市实体在言谈关系中得到体现。例如, 围绕小说中本身便具备连接属性的汽车站、火车站来看, 浮现于言行社交网络的站点, 不但在空间维度上连结大小城市, 也在时间维度上累积着社会历史记忆, 包括周总理逝世、举国哀恸, 改革开放, 进入高速时代等事件。同时, 见证历史的“广州站”是主人公田庄写出《广州站与农民工》的素材, 更是其人生进程的标志物之一, 小说通过田庄同其学姐的谈话, 表达了对于进城浪潮或者说现代化浪潮之下微小个体的命运省思。又如小说写田庄14岁那年(1984年): “这一年, 空气里充塞着火药味, 划根火柴就能引爆。人人都在聊深圳, 那么个小渔村, 三五天一层在起高楼, 疯了吗?”^{[13](210)}而后, 田庄长到22岁, 热切幻想着报纸上读来的深圳河, 以及对岸的香港、中英街、街旁的繁体字招牌, 其内心独白正延续、验证了这种对于广阔新天地的向往。在小说中, 借助一处处艺术时空体, 个人性的自言自语以及激荡内心似百川赴海一般汇入集体性的热烈议论, 营造时代精神氛围, 应和着时代变奏之下的社会发展趋势。

二、言语主体映射城市精神地理

总体上看,上述长篇小说萃取了城市的地方文化记忆及历史内容,透过言语主体触发了城市时空经验的重组,在人物言语对谈中将折叠的空间意义和情节意义一一摊开。在小说的日常生活书写中,诸如此类的细处不胜枚举,散发着地方与历史不断覆盖、叙写后的笔墨气息。与之相应地,繁细对话滑过后各个言语主体的离场,仅是在故事浅层摁下暂停键,而在文本更深处,还存留下一块块组构城市样貌的拼图,正渐次拼接线索,等候着完整。如果说人物话语间性对于城市物质地图的照映,能从承载时空经验的艺术时空体实像中找到显性根据的话,那么它对于城市精神地图的显影作用则更为隐秘与深邃。“话语并不是词语和意义之静态的、理想的或整体的集合,而是一个充满兴趣、参与、张力、冲突、矛盾等的可变领域。这个领域反过来反映出社会的组成、机构,以及它们的内在作用和力量结构。”^{[14](411)}个体的言行并非存在于独占的真空领域,而是存在于联络着有关对象的关系框架之间。要试着释读人物言语活动的逻辑与寓意,就需要讨论内部自我的历史主体、外部环境和其余主体三者间如同排列组合般得出的关系式。这些作品中诞生于人物“自我觉知”的繁杂言语,不但是锚定并图构城市物质性空间要素的鲜活凭依,也是认识及理解城市精神性文化逻辑的直接窗口。无论是面对另一主体,还是面对自我的历史主体,不同情境下的言说举动保持着接收与反馈的持续交互,衬映出主体背后的城市精神微变肌理。

首先,就群体共享经验而论,这些城市叙事沿着人物话语间性的连线,将尘世大地之上的繁多言语主体串联、延散,织造出民风民俗、伦理规范、审美理念等多层次的地方文化景象。具体而言,在言语互动的实体内容上,这些作品从地方文化传统中打捞素材,对常中有变的风俗习惯展开有情体察,在此基础上表征城市的生活文化史迹与独具的精神气质。例如,叶兆言《仪凤之门》的书名便开门见山,指明了一处承载城市丰厚历史的空间装置,于门里门外演绎出南京城的历史沿革及文化烙印。在小说上部的第一章中,一连串言语交互的生活细节便显出时代驶过的辙痕。说着一口地道南京话的哥哥振槐,数落妹妹仪菊的新式衣着:“把祖宗定的规矩,都给破坏了。”^{[15](23)}这一细微冲突,因仪菊的不计较和转向侄女衣着的抱怨被消解,并未产生正面的直接对峙。随即,仪菊又转向对哥哥新换姨奶奶的调侃,令后者尴尬。这处兄妹形象的微妙对比,可以说是为老派人士与新派人士造像,反映了这座城市旧新文化观念的并置、对碰,以及自然更变。兄妹的谈话,蕴于几组祖宗规矩与现代习惯之间的寓意关联,投射的是现代化力量推动下或显或隐的城市文化风俗之变。这也呼应了小说前文:“随着开埠通商,南京城的衣食住行,完全融入了现代元素。舍旧而从新,正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15](22)}在这一长段连续性的对话交际中,新建的华西女校校长仪菊、古板保守的哥哥振槐、第一次坐黄包车的振槐女儿芷歆、振槐的新姨奶奶徐氏等人,同处于黄包车这一空间。人物的对话提及私塾和新学堂等话题,各人谈吐、神态、举动透露出观念互异的分歧现象。由此处可见,从言语内容指向的客观存在,到言语主体的身份、称谓、经历等,无不显示出传统性、现代性共存又革新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又如,单从腔调、口气等表象因素上看,《烟火》里写道:“高掌柜是武清人,可来天津几十年了,也就有了天津口音。”^{[16](13)}地方城市对身处其间个体潜移默化的文化浸染,由此可见一斑。若从人物话语间性的主体性视角来看,在这一细节上,由于对话中的言语主体既可以是同一个体作为历史主体与当下主体构成关系,也可以是不同个体在共时状态下构成关系,故对话的“距离”差异酝酿出了独有的时空张力。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里人物口音的前后比照,也可以说是人物话语间性形态的表现之一。言语习惯的变化背后沟通了当下主体和历史主体的自我对话,同时又暗含着地方认同,更进一步显露

了城市之间地域文化相互交融的历时性形迹以及对人的深在影响。这类融于日常语言的关乎城市习俗习惯的描写,正突出了城市精神地理“常中有变、变中有常”的时代常态特点。

其次,具体到特定人物类型身上还可以发现,这些小说中城市精神地图上的纹样变化与言语主体的动态交际是脱离不开的。在文字搭建的小说世界内,出生于城市或乡村的言说着的“我”,定居、离开或复归城市,在各级行政区划所分界的地域之间选择性地流动,排列出特殊的话语矩阵。这种区际与人际交往的动态关系,又同时代环境下的新课题、新样貌存在一定因果联系。因此,在言语主体、言语环境的通力合作之下,小说由人物话语间性而映射的城市精神地理,也被晕演出时代性色彩。索绪尔提出:“每个人类群体都会有两种永存的因素朝相反的方向牵拉着同时产生作用:(1)乡土(clocher)力量,(2)‘交际’的力量,沟通的力量,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力量。”^[17](39)]其中,具有分划性、多样化效果的乡土力量,指的是乡村空间等有限范围内根植自生命初始的本土性影响。如今,随着城市化的高度发展和乡村经验的迭代深入,这一“乡土力量”慢慢沉潜却又变得愈发厚重。相应地,具有凝聚、统一作用的沟通交流力量则跃出水面,显示出前所未有的有力姿态。“如果说工具理性旨在划定主体和客体的界限,那么交往理性则相信,我们不应执着于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而是有必要建构不同主体的良性互动关系。”^[18]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城市叙事开始走出传统城乡叙事框架,作家从对城乡关系的着重观照,移向专注于摹写城市本体面貌。且进一步向内质询,刻写交际互动之下个体成长史与城市发展史的相融相洽,关注贴合时代新貌的情感结构层次。

如果从人物话语间性的角度入手,这种个体史同城市史的融通是如何达成的?莫里斯·梅洛-庞蒂直言:“不仅仅空间是这样的,所有一般意义上的外部存在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都是只能通过我们的身体才能为我们所通达的,也就是说都是带着人的各种属性的,故此也都是精神和身体的混合。”^[19](25)]或可说,移动的言语意味着移动的身体,而移动的身体又对应着动态的精神联系和地缘关系。这些小说中的人物话语,不光跟随地理意义上的身体移动而变化,实则还糅合了不同区域之间的精神性沟通。比如,鲁敏长期深耕城市题材创作,其接连推出的《奔月》《金色河流》便以城镇县乡之间的动态地缘关系为基石。在《金色河流》里,深圳、上海、香港等城市被置于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中,人物的交谈轨迹将各个时空节点紧密关联起来。如有的研究者所言:“在开篇就描述这群富人消费自由、逍遥自在的生活表面之下,鲁敏其实在讲述这群富人的归途:成为历史。”^[20]这部作品是从宏阔的时空观念与整体意识,发现时代作用于“小老板”等众多典型群体的生产力、驱动力与形塑力。在此基础上,小说描勒出城市这一社会空间类型的精神生活脉络流变,透过大量独语、录音等内容探视言语主体的灵魂面目,传递关于生命与财富的价值省思。

具体来看,在这些作品的城市书写中,言语主体成为活动着的立体纽带,在城市之间辗转,衔接了彼时和此刻、彼处和此地。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的城市本身亦拥有能量,能够帮助言语主体定义并重构自我性。小说里,拥有“漫游者”或“底层者”等身份的诸多个体,寻觅并确证自身的位置,彰显出特有的素朴精神意义。对于底层者形象书写而言,许多作品的共通点在于涉及“真”与“善”的价值思考和永恒追觅。如有学者论及王松的《烟火》等市井小说的共通性:“在市井风俗与市民文化层面发掘人性的光辉,在斑驳杂糅的生活中呈现人物的复杂性与丰富性。”^[21]还有《装台》《人世间》《烟火漫卷》《烟火》等小说均深入考察城市底层经验,言说之声的来回传播与身体的移行活动之中,萦绕着求真求善的价值立场和理念追求,营构出主体所置身的城市人性冶炼场。由此,这类作品通过为人性晖光所烛照的平凡日常细节,综合性地经营大小城市、城中村等彼此存在血亲关系的社会空间,并度量它们在社会文化整体中的价值位点和精神意涵。

对于漫游者形象书写而言,《黄雀记》《耶路撒冷》《奔月》《烟火漫卷》《暂坐》等小说都隐含一种循环圈型的“出走”叙事。在小说所呈现的城市内外塑形进程中,人们往返于生活的班列路线,这

种来回的挪移其实是为了找寻确定的心灵目的地,即使这种“确定”也可能是暂时的。詹姆斯·保罗·吉曾提出“常规字体的‘话语’”这一概念,“以此表示使用中的语言或语言的延伸(比如会话或故事)”^{[22](28)}。作品里各类人物所展开的对话交锋,既实实在在留下了各类人物所说的话(句与词),又呈现出这种具体语言语法的运转延伸现象,动态持续地形成情绪氛围与精神意味。借助文本边界之内的“常规字体的‘话语’”,这些小说深入探问了个体是如何嵌入不同城市组织结构的,其生存样态、观念追求与情感体验是如何发生渐变的。事实上,这种城市人的“逃逸”现象在文学史上已得到反复书写。“为了疏解人物的精神痛楚,作家不时安排主体从城市生活中逃逸,或是城里人归向田野,在诗意化的自然中重拾自我;或是打工者回到自己的故乡,在城市之外营造新的生活。”^[23]那么,新时代长篇小说城市叙事中的一些出走者,是否表现出创作主体新的社会关切与自我省察?大体上看,在这几部小说中,从城市出走的人物又出于种种原因返归,形成一种“出走—待续”或“出走—回归—待续”的叙事模式。地理上的向外逃脱或闯荡,隐喻的是心理上的游离、彷徨,以及生活定位的未完成状态。例如,《烟火漫卷》中的榆樱院里生活着从故乡出走至此的外地人,贾平凹的《暂坐》以“人物+处所”的格式为各章命名,主人公伊娃自西京的数次出走背后隐含着迷茫徘徊的生存焦虑问题。在《奔月》中,南京几乎是小说时空界限内的起点和终点,主人公小六回身选择返城之行,表面上是画下生活环路的最后一笔,回旋中却似乎摩擦拉扯出更多纷杂线头。城市个体困于模式化、复制式、回圈状的精神生活漩涡,而难以得到圆融的成果。就像有人评析苏童《黄雀记》:“仙女始终生活在这座城市所编织的渔网之中,离开时没有真正离开,回来时也没能真正回到这个城市。”^[24]由此,处于人事物往复缠绕之间的文化体验变换,为诠释城市精神地理提供了启发性反思,如何实现真切的心理完满成为留待解决的深层问题。又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叙说个体从乡村、从小城镇花街、从大城市北京的重重出走之旅。主人公初平阳问铜钱:“你想到世界的哪个地方去?”^{[25](23)}铜钱答:“到世界的世界去。”^{[25](23)}这一应答几乎是文中之眼,喻示着由脱离个体具象客观逐步奔向抽象宏大的精神追求,对谈间氤氲着未知的召唤。自我的定位开始浮现,而地点似乎不再重要。

总之,在诸多相关叙事中,城中人同时面对的当下疑难和未来遥想,刻印在人之城的地图两面。如果我们将目光收束至人物话语间性的主体性特征,即聚焦一个个言说着的独立主体,或许更便于理解城市精神地图的意义。这些切入社会性精神症候的个体言语写照,荫蔽在现代城市繁华细琐的景色下,为城市精神地理拼上了满布噪点的一块。由此以小见大,文本便得以阐发地方城市在经济与文化之气候下的精神纹样。就像地质地理图中有着不同的地貌信息,小说之内城市世界的精神地理图中也有着历时或共时的各异纹路。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城市叙事不单单是选取某一时间范围内城市社会的切片图,而更呈现出紧扣时代视界的文本建构特性。

三、语解“风土城市”的审美张力结构

作为别致的“城市地图”,小说中人物话语间性所显影的城市貌态具有多层特征,包含了对应小说里地名、物名等的指示性注记,以及对应情绪或事件信息的说明性注记,建构于话语之间的社交关系图谱等。因此,它们既在局部中存在串联型的地理序列和文化序列,又在整体上存在普遍性的表层历史结构与内里精神结构。也就是说,在这些作品中,人物话语所敞显的城市既是地理坐标,更是文化坐标、精神坐标。此外,除了潜藏于情节层次的人物话语的具体内容,其形式同样也可被视为绘制城市的取景器,二者一同协助搭建层层叠叠的文学城市形态基底。巴赫金曾逐一梳理长篇小说中对话的四大类型,包括日常生活对话的多种变体、事务性和职业性对话、思想观点的对话、不同类型的内

心对话^{[2](215)}。他指出:“长篇小说作者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要善于营造对话情境。”^{[2](215)}人物话语间性便孕育于这些多元化的对话情境之中。形式多样的言语活动好似一种另类的缝合:处于对话中的相对视角来回切换,牵引出填补城市地图的丝线,你来我往地缝缀出“不在场”的一点一域。进一步说,这些涌现于对话情境的人物话语还依靠其间性特质,引导着多类艺术张力的生成和缠络,深广的历史文化记忆和微细的个人日常记忆正栖身于此。小说里基于无数言语主体的纷纷“杂语”,鲜明而生动地流通着,以多重审美张力结构来图解“风土城市”的显在与内面特质。

其一是传统文化根脉与现时创作创新之间的张力。这些创作主体对于“风土城市”的解读与刻画,可以认为是汲取了来自传统与创新的叠合之力。具体而论,属于地方语言传统、文学文化传统的力量随着对话纷至沓来,成为小说创作的关键活力源。一方面,张力表现在人物言谈对生长于地方的方言、俗语、腔调、民谣等的有意运用。小说中这些含有地域文化质素的人物话语,标记了分属各个城市的独特人文韵味。“语俚而意切”,直观地解码并渲染出一个个活生生的地方性文化情境,进而丰满了饱含沪味、陕味、津味等韵致各殊的宏观地图。从言语活动的场景来看,《繁花》里有“我有事体”“谈谈斤头”“轧朋友”“花头花脑”“瞎七搭八”“睏觉”“长脚螺丝钉”等沪语,《燕食记》里有辅以脚注解释的粤语方言,《装台》里有“真格是”“急煞火”“挣失塌”“下苦”“麻达”“受活”等方言,《烟火》里随处可见“儿”“甬”“忒”等北方方言用词。《烟火》中还遍布着“街上有句话”“老话儿说”“生意场上有一句说滥了的话”“手艺人有一句常说的话”等天津俗语行话。这种话里有话的铺写衍生出“裂隙”,亦使言语活动在最为素朴的传声本质层面交叠出张力空间。同时,创作主体也并非全然挪用世俗方言,而是进行一定艺术改造,比如秉持“改良沪语”观的《繁花》中反复出现的“不响”以及生僻用语的删减。“在人地关系影响下,人的恋地情结的历史文化积淀,促使作家产生了独一无二的地理基因。所谓‘地理基因’,是指地理环境在作家身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痕,并且一定会呈现在自己所有的作品里。”^[26]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城市叙事同样如此。创作主体受到不同地质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的复合影响,城市的建筑体系、习惯规范、母语方言等元素在作品中营造出程度不一的地理乡愁,生发出人地双向互动循环下的特有审美价值。整体上看,在人物对话应答的交互性场景下,地方灵韵萦绕在朝气蓬勃的言语中。不同作品深情刻划作为乡愁载体的城市风貌,挥洒自如地勾绘出错落有致的城市文化谱系。另一方面,张力表现在现代城市书写对于中国古代话本传统的遥相呼应,这一叙事特征在《繁花》《装台》《烟火》等小说中皆有所体现。金宇澄在《繁花》的“跋”中自述:“放弃‘心理层面的幽冥’,口语铺陈,意气渐平,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27](443)}作者在此强调了该小说所借鉴的传统话本样式,文本中成块连篇的言语互动回归传统,又沉淀出“俗话雅说”之情致,以说书人口吻完成城市社会文化记忆的别致陈说。可见,这些创作手段之新在于对同质化城市叙事的拒斥、对反均质性艺术的真挚追求,其手段之活在于个人化的多元多变,达成对各类传统叙事资源的差异化应用。姿态各异的话语呈现形式,开启了一个活跃、新异的城市表现视域,带来奇特化的审美体验。至此,还可以发现,从物质层之艺术时空体的历史性色彩,到精神层之群体或个体记忆的时代性意味,再到这里言语形式的“传统—现代”双重因子,重重叠叠的历史感正证明一种历史理解观念的显著变化。可以说,在这些小说中,镶嵌于人物言语活动的新旧建筑、风尚习俗、价值追求、张力结构等,皆是时代历史内容提炼之下的产物。封存在话语深层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积淀,亦从城市维度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精神的自觉承袭。

其二是艺术化与日常化之间的张力。这些城市叙事普遍从现实日常的人切入,以更为明朗的问题意识回归尘世生活层面,锁定人与人、人与所在时空的关系之链。创作主体犹如捡拾贝壳般择取细微现实,并进行艺术雕刻,指引读者重历特定时期的城市生活,且无一不注重日常性、精细化的话语呈现。有学者评价道:“《繁花》是一部有着自己腔调和言说印记的,发现并肯定日常经验和平凡物事‘诗

意’，而不仅仅是‘史意’的小说。”^[28]不单是《繁花》，那些人物对白的个性化痕迹和日常性特征在其他有关作品中亦是相通的。一系列作品往来对话的梭织交错，建构起现实性社会图景，展现出调性独特又不失平易的生活纹样。在潜层历史脉络的整体贯穿之下，这些作品凸显了城市驳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日常脉象，通过多种手法着力突出言说体量与模式的真实性和平实化。

比如“漫谈—沉默”的二元结构划分，使得鳞萃比栉的生活化对聊涌动出呼吸着的生活节奏和源源不竭的生命活水。在这里，可以回到现实视界，俯瞰一座座城市，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生产对话闲谈的细密气泡，起起灭灭又洋洋洒洒，长短不一又永无止休。这正是城市生活的日常形态。真实的言说并不是统一规整、篇幅相近的，也并不都是在相对正式场合下产生的。因此，这些创作主体察觉并复现了这一本质表现，笔下的漫谈与沉默一如现实，又在艺术化处理下对应着生命的流动和意义的悬置。小说中那些不可计数的闲聊或漫谈、原因未明的缄默，既对现实日常语言习惯进行镜像复制，又内含留待联想琢磨的互动性力量。可以说，看似松散繁冗的絮叨、看似含混不清的无言，形成表征精神体验的文本皱褶，而解读城市及其间个体本性的深秘线头正隐伏其中。有学者说得好：“中国文学‘画境’的营造一向是建立在丰富的想象与幻象的基础之上的，不停留于物理的‘图像’效果，而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幻象’感。”^[29]这些复原日常语境的城市叙事亦承续了如此的“画境”范塑。不限于借文学想象来指陈多重真实路标，而是在一些语意不充分的对谈背后，凝结出富含情感厚度与价值深度的精神虚像。不同语境背景下，有声或无声的言语来往组装出有意义的结构，文本内里具体的个体立场、情感色彩溢出余音。

再如，在这些小说里，来自南北不同地域的方言土语与普通话杂糅一处，亦是近似当下日常言说经验的一种现实体现。《装台》中的主人公顺子说道：“寇主任都说了，这台确实难装，演个晚会啥的还可以，但演戏，尤其是演靳导的精品力作，麻达确实比较大。”^{[30](392)}方言“麻达”与普通话“比较大”相组合，地方性话语与现代公共话语近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而《繁花》中的这类言语组织更是布满全书，如“女人说，这位男同志，长脚螺丝钉，长是真长”^{[27](256)}。通用的普通话与地方专属的地道方言被一同采撷并呈现，艺术化地重现了真实语境之下的日常用语习惯，为小说中的城市图景增添了日常感的原朴光泽。又如，一些不加引号或加引号的语词表达格式，即时面谈、延时录音、手机短信等虚实交错的对话情境等，散布于这些小说各处，进一步强化了文本的明暗度与对比度。像《金色河流》便给予人物录音较大篇幅，录音笔里主人公穆有衡的第一人称独语，常借其他人物引出并铺开：“多少天了，每想到那装满往事的录音笔，可真是百爪挠心！”^{[31](266)}可见，相关作品所采用的言语表现形式多样、参差错落，接替诉说着发生于城市内部的繁细故事，进一步凸显城市寻常生活的本色质感。除此之外，从人物话语返归相应的言语主体形象来说，亦是“各表身分”“人各有当”。如《烟霞里》中这样描写知识分子：“一字字捺住，口吐莲花，句句典雅，有来源，有出处。”^{[13](507)}写担任公司文员的小年姐姐：“全家就数她最文气，轻声雅语。”^{[13](605)}而《黄雀记》里骄横尖利的仙女、到保润家兴师问罪的女主任则是言语泼辣。这种恰如其分的言语匹配，是因为创作主体关注到隐藏在块茎式言语网络之内的生活褶子，以此深化还原了现实日常经验世界之中普通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这些作品以符合生活规律的逻辑系统构建日常诗学，将排闼而至的言语活动娓娓道来，影印成琐碎、精细又气韵生动的城市日常生活画册。在更深层次上，这种书写方式实现了贴近五官感知的真实调度，对日常本相不厌其烦地进行诚实雕镂，说明作者实质上已将言语主体提升为生命本体。因此，在繁复内容和审美形式的双重作用下，这些长篇小说所展开的城市地图绝非冰冷单调的文字数据。不论是彰显地域文化和历史记忆，还是深描往来于城市的无数个体的精神表征，这些重视生命性言语活动的城市叙事，都被赋予新鲜动能和丰盈情感，最终完笔的是一幅幅具备听觉性质的、含情的、动感的城市图画。

四、结语

循着城市叙事的现代文学史脉络,可见标示文化符码的城市经验已化为重要创作资源,文学世界内部的“北京”“上海”“哈尔滨”等城市已然构成意涵无限富厚的形象谱系。现代化步态的加速,促使文学范畴内“城市”定义的蕴含与外延持续深化、丰沛。新时代长篇小说在这一叙事传统的延长线上行进与勘探,在努力外拓城市样貌的横宽面之际,也不忘细化城市历史的纵式架构。作为小说重要的构成性要素,诸多人物话语处于动态变易之中,随时代之河一齐奔流,造就一城自具生命性的多维地理,并辉映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曲折性、创造性与巨大成就。一方面,这些地域性的艺术概括是将所认知的城市世界落实于具体角色之上,图解于繁多言语之中,借此抵达地方,抵达基于自然地理分区的审美建构;另一方面,人物话语所暗含的个人化隐秘经验与公共性集体经验,则进一步超越地理学意义,摊开城市生活的内外两面,透射出专属于城市的精神层地图。至此,在人物话语间性所织就的动态关系之网中,从交互的主体拓展至主体所身处的城市全貌,无一不获得现身显影的厚实证明。海德格尔在论及艺术的本质时曾强调:“艺术作品绝不是对那些时时现存手边的个别存在者的再现,恰恰相反,它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32](257)}新时代长篇小说的城市叙事抓住地方、历史、人城关系等关键词,以针脚细密的日常化叙事,对某一地自然、社会、精神景观进行综合观照与深层解析。那些着眼于城市空间新象旧貌的“深描”,更内蕴了关涉物之本质、人之本性的思辨。由此,这些作品中连续性的空间序列和故事序列,实际上扬至地理美学和文化诗学的维度,形神毕现,而非浮泛于浅表的粗粝描摹。若将言语活动所映照的不同城市板块合并起来,不同作品中诸多单一的城市“小地图”可以整合成超越地方、横跨时空的精神“大地图”,从而为总体性的中华文化大场域增色添彩。

参考文献:

- [1] 埃德蒙德·胡塞尔. 生活世界现象学[M]. 倪梁康, 张廷国,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
- [2]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4卷[M]. 白春仁, 晓河, 潘月琴, 等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 [3] 李云雷. “新时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分期问题[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4(10): 1-12.
- [4] 理查德·利罕. 文学中的城市: 知识与文化的历史: 2版[M]. 吴子枫,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 [5]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第3卷[M]. 白春仁, 晓河,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6] 王晓磊. 社会空间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7] 斯维特兰娜·博伊姆. 怀旧的未来[M]. 杨德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 [8] MORETTI F. Atlas of the European novel 1800—1900[M].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1998.
- [9] 付长良. 地名规划概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 [10] 周景雷, 范晨芳, 吴坚, 等. 市民主义的复活及其批判: 简评金宇澄的长篇新作《繁花》[J]. 当代作家评论, 2013(4): 68-72.
- [11] 迟子建. 烟火漫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
- [12] 申霞艳. 须弥入芥子, 烟霞出精神: 关于《烟霞里》[J]. 当代作家评论, 2023(3): 138-142.
- [13] 魏微. 烟霞里[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 [14] 格洛登, 克雷沃思, 济曼. 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 第2版[M]. 王逢振, 等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1.
- [15] 叶兆言. 仪凤之门[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
- [16] 王松. 烟火[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20.
- [17]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M]. 屠友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18] 庞弘. 论文学阐释的交互主体性之维[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9(2): 191-199.

- [19] 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的世界: 论哲学、文学与艺术[M]. 王士盛, 周子悦, 译. 王恒, 审校.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9.
- [20] 任竹良. 财富观、心灵史与当代性: 论鲁敏长篇小说《金色河流》[J]. 当代文坛, 2023(1): 93-101.
- [21] 闫立飞. 色彩谱系、数学思维和市井烟火: 论王松小说[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4): 96-102.
- [22] 詹姆斯·保罗·吉. 话语分析导论: 理论与方法[M]. 杨炳钧, 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 [23] 卢桢. 新时期以来中国城市文学的现代化叙事[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10): 65-84, 205-206.
- [24] 陈逢玥. 罪与罚: 论苏童的《黄雀记》[J]. 南方文坛, 2013(6): 90-93.
- [25] 徐则臣. 耶路撒冷[M].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
- [26] 邹建军, 卢建飞. “地方性”与世界文学的形态、演进及审美特性[J]. 文艺论坛, 2023(3): 83-91.
- [27] 金字澄. 繁花[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3.
- [28] 何平. 爱以闲谈消永昼: 《繁花》不是一部怎样的小说[J]. 当代作家评论, 2013(4): 63-67.
- [29] 侯小丽. 既为“画不出”, 又是“活画出”: 中国古代小说“拟画”评语之理论旨向探索[J]. 中国文学研究, 2024(2): 78-86.
- [30] 陈彦. 装台[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 [31] 鲁敏. 金色河流[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2.
- [32]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M]. 孙周兴, 选编.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Interality of character discourse and the reflection of urban maps: A discussion on urban narrative of full-length novels in the new era

YAN Jiexiong, ZHU Xuany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n the urban narratives of full-length novels in the new era, a wide variety of characters walk through multiple social spaces, and the various words spoken by the characters provide the key entry points for intervening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urban form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Among these words, there exists a kind of “interality of character discourse”, namely the intrinsic correlation and interactive influence among character discourses. A series of works, through the interality of character discourse, organize different layers of the city. They not only encompass the geographical spatial installations and their distribution at the material level, piecing together a geographical visual scene beyond discourses, but also accommodat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qualities as well as spiritual components, depicting the spiritual landscape of the same era. The authors have found common syntactic systems between the real city and the literary city, and the organic application of local languages, story-telling scripts traditions, and the essence of daily life have folded multiple aesthetic tension structures. Thus, the various urban worlds with inner life contained in the novels begin to connect into new urban image communities endowed with geographical aesthetics and cultural poetics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full-length novels in the new era; urban narrative; interality of character discourse; urban maps

[编辑: 陈一奔]